

命名與框架

— 港台報紙有關中國新聞內容的比較研究 (1977-2017)

蕭蘋

國立中山大學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

吳浩銘

美國波士頓大學

摘要

本研究探討香港與台灣兩個在地緣政治中與中國具有密切連動關係的社會，在其新聞報導中如何使用不同的中國稱謂，具有何種意涵？在不同的時期產生了何種不同的變化？本研究將媒體對於中國的命名視為框架包裹的一部份，探討港、台做為不同的論述社群，如何對不同的中國稱謂（包括：中國、中共、大陸等），建構不同的框架包裹與意義，並且如何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所變化。本研究收集 1977 年至 2017 年港台兩地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共 2771 則樣本，進行量化內容分析。結果發現，在第一階段（1977-1997 年）和第二階段（2007-2017 年）之間，港、台的新聞內容中使用各種中國稱謂的方式與其所連結的框架包裹，都具有十分顯著的差異與變化，這些差異與兩岸三地之間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的變化相符，而這些名稱的使用不只傳達出與中國的關係的不同演變，也與港、台內部社會中主體認同的發展有關。

關鍵詞：香港、台灣、中國、報紙新聞、命名、框架、內容分析法

蕭蘋 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所教授，研究領域為性別與媒介、政治傳播、國際傳播。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政治傳播、新聞學、媒體與社會運動。

吳浩銘 美國波士頓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傳播和政治傳播。

（收件：2022/11/23，修正：2023/4/11，接受：2023/9/27）

壹、緒論

近年來，中國做爲一個崛起的霸權國家，已成爲社會科學各領域學者關注的研究主題與焦點 (Fishman, 2005; Howarth, 2006; Ross and Feng, 2008)，國際傳播作爲研究中國的切入點也因此日趨重要。在傳播研究的領域中，許多文獻皆著眼於中國在西方國家媒體內容中的形象與相關資訊，是如何被塑造、影響與流通，其中又特別以美國的媒體作爲主要研究對象 (Mackerras, 1991)。在過去，中國的形象在美國媒體的內容呈現中，如同鐘擺一般，呈現出劇烈且反覆的擺盪，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形象 (Du, Zhu, and Yang, 2018; Ha et al., 2020; Ha, Guo, and Chen, 2022; Isaacs, 1958; Liu, Boukes, and De Swert, 2023; Mearsheimer, 2001; Ooi and D'Arcangelis, 2017; Peng, 2004; Steinfeld, 2010; Willnat and Luo, 2011; Yee, 2010)。這些不同時期之間，美國新聞內容中所呈現中國形象的差異，生動地說明了過去幾十年間，美國人對中國所抱持的情感與理解，不僅正反交替、而且變動的幅度相當驚人 (Peng, 2004)。

過去相關的研究文獻，大都集中在西方媒介的內容中對於中國形象的建構，相較之下，較少有研究針對與中國具有更密切連動關係的東亞鄰近地區和國家的媒體在其新聞內容中如何對中國進行報導，特別是香港與台灣。在過去 50 年之間，所謂「兩岸三地」，包括：香港、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重大的轉變，同時在其社會內部的政治權力結構與傳播媒體的產業亦隨之出現變化。香港最重大的轉變在於 1997 年由英國的殖民地回歸中國，傳播媒體從此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步萎縮，在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排名中，香港由 2002 年的全球第 18 位下跌至 2020 年的 80 位，再急跌至 2022 年第 148 位。不少政治與社會學者指出，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解與中國政府之間長期存在分歧 (呂大樂, 2020; Scott, 2017)，而進入 2010 年後，香港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相關經濟、貿易、文化政策的不滿逐漸增加，中國對於香港在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領域的控制，則愈發緊縮 (Fong, 2017)，因而引發了 2014 年的雨傘革命和 2019 年反修例等社會運動。

台灣在過去 50 年內，同樣和中國之間有著微妙複雜的交互關係。國民黨在 1949 年自中國大陸撤退至台灣，中國共產黨則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兩個政權在 1950、60 年代相互敵對。1970 年代末期，PRC 開始號召兩岸的和平統一，並且同樣以「一國兩制」對台灣喊話，另一方面，台灣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也堅持最終走向統一的目標（Liou, 2013）。但自 1990 年代開始，台灣的主體認同有顯著的成長（Chu, 2004），2000 年民進黨首次取得執政，當時的總統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的主張，曾經引發中國政府的不滿。雖然政治情勢上變化詭譎，但在經濟方面，2001 年台灣加入 WTO 之後，隨著台灣產業外移至中國，台灣在經濟上有日益依賴中國的趨勢。

香港、台灣和中國之間，都具有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緊密關係，新聞媒體在有關的報導內容中對於中國所使用的稱呼名稱，在兩地之間隨著時間的演變也都互有差異。細察港 / 台兩地對於中國的稱呼包含：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共匪、大陸、兩岸、對岸、內地等名稱，這些不同的名稱在不同地區與不同的時代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涵，標示了台、港與中國之間，從親近友好到敵對衝突，或從割離至統一的變化。如同 Pan 等人（1999）的研究所指出的，香港在 1997 年回歸給中國之時，在媒體的報導中，香港成爲一個意識型態競爭的場域，不同的論述社群（discursive communities），包括：中國、台灣、香港、英國、美國等，對於香港的回歸在當時都建構了各自不同的論述。如今崛起中的中國霸權也同樣成爲一個意識型態競爭的場域，生活經驗不同的香港與台灣做爲不同的論述社群，具有不同的詮釋架構和討論方式。本研究特別關注港、台的新聞媒體對於中國相關報導的差異，進行比較，比較的路徑將著重在對於中國所採用的不同命名（naming）所具有的不同意涵。

對於中國不同命名的轉變，深埋在歷史的淵源之中，同時也影響了歷史的發展。這些不同的命名方式，影響了意識型態與政治的形構（configurations），進而影響了權力的重組。對於中國不同名稱的使用，一方面可加以製造、指定、與挪用，以達成政治的議程（political agenda）與動員，但另一方面名字也會

被拒絕或受到爭議 (Bakhtin, 1986; Bhatia, 2005)。此外，港、台對於不同的中國名稱的使用，也與想像社群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erson, 1983) 的激發與建構有相當的關係。在台灣，對於不同的中國名稱的使用，除了與兩岸關係的遠近親疏有關之外，也與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發展具有相關性 (Chang and Holt, 2011, 2015)。同樣地，命名中國在香港政治中也有其獨特的位置。例如香港人慣常掛在口邊的「中港關係」，在近年變得「政治不正確」，早在2015年，傳媒就報導香港特區政府向公務員發出通函，在描述兩地關係時，要使用「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而不是「中港關係」的說法 (葉靖斯, 2015)。這大概是因為後者假設了中國和香港是對等的兩個實體，而特區政府強調的乃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進一步而言，研究台灣和香港的新聞媒體如何「命名中國」，就是看媒體如何以最基本和最不顯眼的方式塑造人們的身分認同以及對中港 / 兩岸關係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 Michael Billig (1995) 的名著 *Banal Nationalism* 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國族主義很多時候會以不經意和不起眼的方式恆常存在於人們的身邊，鞏固著人們的國族認同和概念。Billig 以國旗做例子，在國家隊參與比賽時被揮動著的國旗是一種明顯的和在意的國族主義，然而在政府大樓前恆常地掛起來，平時路人不屑一顧的國旗，則代表著一種不經意的國族主義。從 Billig 的思路出發，新聞媒體其實每天都以很不經意的方式強調著一個地方在世界中的位置。例如：香港媒體在 97 前會把江澤民稱為「中國國家主席」，但今天的香港媒體稱習近平為「國家主席」，「中國」兩字可以省略，因為既然是中國的一個特區，就不用加中國兩字，又例如在版面編排上，香港報章以「港聞」為主頁，然後有「中國新聞」版，而台灣新聞會被納入中國新聞版裡，之後才是國際新聞，這也是恆常地設定了一種基本的世界觀。而如何稱呼中國，或在甚麼樣的新聞中以甚麼名字來稱呼中國，也可以被理解為這個平庸、不起眼的世界觀的一部分。

貳、文獻探討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在東亞社會具有全面影響力的儒家，曾指出命名所具有的重要性，儒家認為名正則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劉世寧，2018）。從現代社會學的觀點看，名字可以指出一個人在社會階層中所在的位置，並且可以標示與建構關係（Blum, 1997）。從現代社會科學中的建構主義立場出發，命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來學者們運用各種不同的觀點，包括：歷史、語言學、論述、文化、語藝學等，來研究命名的問題（Azaryahu, 1997; Horsman, 2006; Lefebvre, 1991; Coakley, 2009; Alcoff, 2005）。

在探討命名與政治如何交錯影響的議題時，Chang 和 Holt（2015）建議可將命名視為一種「隱喻」（metaphor），亦即國家的稱謂是符號的機制（symbolic devices），是一種概念的凝鑄，由複雜的社會歷史情境加以提煉而成。一個命名其實是集結了一連串規範性的關係、動機與特色，連結到被命名的事物上（Bhatia, 2005; Nevins, 2008）。因此，當命名謂隨著歷史而改變時，對於政治現實的認知與建構也會隨之改變，反過來說，政治現實和認知的轉變，也可以使人們對同一樣事物使用上新的稱謂（Edelman, 1971;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Miller, 1979）。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於中國所採取的稱謂，即交織著多重層次的歷史意義。Chang 和 Holt（2015）針對台灣歷年來的總統在正式演說中對於中國的稱謂進行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台灣藉由這些不同符號的運用，包括：共匪、中共、大陸、對岸、中國等，以獲取、建立和維持其認同。

名字不只是概念的框架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中的一種符號機制，經由不同的定義的交織，可以建構被命名的事物的意義。一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符號，而在一種語言文化中，不同的符號會連結著不同的觀念和其他符號，所以命名會影響人們腦海中的聯想。因此中國政府極力反對將新冠病毒稱作「武漢肺炎」，世界衛生組織在命名變種病毒時跳過了「xi」而引

發了討論。而對於國家的稱謂，則是與「集體記憶」(collective remembering) (Wertsch, 2002) 的敘事、以及不同文化或政治實體所構成的「想像社群」(Anderson, 1983)，相互的激發與彼此維繫生成 (Chang and Holt, 2015)。

政治上與名稱相關的爭議會影響對於歷史的型塑，名稱會創造出某些類型，並建構政治的真實 (political reality) (Edelman, 1988; Miller, 1979)，因為一個名稱中選擇使用的字眼會對人們的認知設下一些看不見的界限，並建議對其採取的評價態度 (Kiewe, 1998)。例如：將 97 香港回歸稱作「回歸」還是「主權移交」，強調的就是同一事件中的不同面向。Alcoff (2005) 認為，名字總會激起特定的具有譜系或合法性的敘事。如果將名字視為論述 (discourses)，各種名稱之間會競爭優先性，命名的過程中即可能充滿意識型態的衝突、將關係合法化、並維繫權力的差異 (Fairclough, 1989)。在政治的場域中，命名通常會與權力直接相關，因為不同的權力擁有者可能會傾向使用不同的名字來稱呼同一事物，而使用哪一個名字，有時就已經是一種立場的選擇，以符合其所設定的政治議程。例如：在台灣東北面的一個向來具有主權爭議的列島，在台灣、香港被稱為「釣魚台群島」，但在日本則被稱為「尖閣諸島」，媒體在相關報導中如何使用命名，也代表了一種主權立場的選擇。因此，名稱的改變會影響權力的重組，影響意識型態與政治的形構，因為在政治的議程中，名稱會被指定與挪用，以鼓舞行動，雖然名稱也可能會被拒絕或受到爭議 (Bakhtin, 1986; Bhatia, 2005)。

命名與文化框架

由於命名所具有的重要性，從傳播研究的角度而言，在媒介內容中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可以跟「框架」(framing) 的運作結合起來加以探究。因為在新聞報導中，不論是針對國家、公共政策，或疾病等所使用的不同稱謂 (Temmerman, 2010; Smith, 2021)，媒體通常是在一個特定的參考框架中，根據某些隱含的意義結構來建構新聞的內容 (Tuchman, 1978; McQuail, 2005)。

在港台有關中國的新聞內容中，對於中國的稱謂即具有這種框架的功能，可以將新聞文本中包含的不同要素，包括：主題、立場、架構等整合起來組成新聞。

「框架」的概念源自於社會心理學，Goffman (1974:21) 將之引進到傳播與媒體的研究中，他認為框架是一種「詮釋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會幫助人們定位、覺察、認同與標籤許多發生的事件。Gitlin (1980:6) 將框架定義為「選擇、強調與呈現的原則」，包含有關什麼是存在的、發生與重要的隱微理論。Gitlin (1980) 將框架視為一種「選擇和強調」的看法，影響到後來許多研究者的觀點 (Entman, 1993)。

由於框架的一個主要特色即在於它是隱而不顯的，看起來很自然，但對於社會卻有很大的影響，會影響公眾對於新聞的理解方式、以及對於真實的認知。Van Gorp (2005, 2007) 以社會建構論為基礎，提出文化框架 (cultural framing) 的理論，他認為框架就是一種「後設傳播的訊息」(meta-communicative message)，存在於文化之中。此外，Van Gorp 還提出一種「框架的文化儲藏」(a cultural stock of frames) 概念，亦即有些框架在某些社會、政治、歷史的脈絡或時期中具有主導性，在其它的歷史時期或社會脈絡中，則有不同的框架出現。

Van Gorp (2007) 進一步提出一個可以操作化進行實證研究的概念——「框架包裹」(a frame package)，用來探討新聞中所隱藏的框架。他認為每一個框架都具有一個「框架包裹」，其中包含了三種重要的元素——框架機制 (framing devices)、推理機制 (the reasoning device) 與文化現象 (a cultural phenomenon)。其中，「推理機制」指的是定義問題、診斷原因、進行道德判斷與建議補救之道，推理機制在有關社會問題或社會運動的報導中尤其重要 (Benford and Snow, 2000)，但較不適用於媒體如何報導一個國家或地方，本研究著眼台港兩地媒體如何報導中國，所以較為關注另外兩個「框架包裹」的元素——框架機制與文化現象的內涵與運用。

具體而言，框架機制包括用字的選擇、譬喻、舉證、描述、論證 (arguments)、視覺形象等。這些明顯呈現的框架機制都是被統合在一個框架

之下，具有一個整合的結構。在本研究中，框架機制主要涉及新聞中對於中國的命名、新聞題材 (topics) 與報導呈現的基本立場。我們預期三者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關聯性，即某種命名方式應該較多在某些題材中出現，以及會與報導立場掛勾。

至於文化現象，指的是一個中心主旨 (a central theme)，例如：一種範例、價值 (如：新聞自由)、敘事等。Gamson 和 Modigliani (1989) 指出，一個框架的中心主旨是一個有組織性的想法，整合新聞的基本意義。Van Gorp (2007) 在其討論中曾舉 Pan 等人 (1999) 的研究做為說明，在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刻，中國媒介所使用的框架包裹中，中國做為一個國與家 (a nation family) 的迷思即可視為一個中心主旨。在同一研究中，英國媒體對香港回歸報導的中心主旨為「光榮撤退」，美國媒體報導的中心主旨則與冷戰和意識形態之爭相關。不過，相比 Pan 等人 (1999) 聚焦於單一新聞事件的研究，本研究涵括兩個社會幾十年來對中國的報導，所以需要集中於一些能夠在不同年代和不同事情上均大致通用的中心主旨之上 (Brugman, Burgers, and Steen, 2017; Semetko and Valkenburg, 2000)。從過去的相關文獻中 (Ojo, 2016; Golan and Lukito, 2015; Zeng, 2018; Krumbein, 2014; Ooi and D'Arcangelis, 2017; Rodríguez-Wangüemert, Rodríguez-Breijo, and Pestano-Rodríguez, 2019; Wilke and Achatzi, 2011;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我們整理出有關中國新聞報導中的四種主旨，包括：朋友、敵對、互動 (engagement)、威權。前三者著眼於中國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關係，第四個主旨則涉及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強調。

研究問題

總括而言，本研究認為，命名作為框架的組成部分，與新聞題材、立場傾向、中心主旨等會連結起來，成為一個框架包裹，形成一種意義的系統，而這些意義系統的形成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期，都會產生差異。根據這些理論考量，我們將提出一系列的研究問題，有兩點需要先作說明。第一，如前文所

述，由於中港和中台之間的關係具有不同的複雜性，較難直接進行比較，因此本文中將台灣與香港的資料分析分開來處理，最後總結處再合併討論。所以，以下的研究問題會將台灣和香港的情況分開處理。

第二，本研究分析來自 1977 至 2017 年間五個特定年份的數據，為確保分析的精簡程度及意義，我們將五個年份分為兩個時段，第一時段包括 1977、1987 和 1997 年，第二時段包括 2007 和 2017 年。對台灣而言，如前所述，雖然兩岸關係因經濟社會連繫以及台灣兩黨之間的立場差異而有其錯綜複雜之處，但籠統地說，1977 至 1997 年間是兩岸重新開始交往的時期，2007 至 2017 則是台灣民主化進程完結，台灣本土身份認同確立的時期，因此台灣媒體在第二時段更有可能放棄強調台灣作為一個代表「中國」的政權，而將「台灣」和「中國」視為平行的兩個政治實體。將這個場景因素與之前的概念考量結合起來，我們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Q1：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台灣報紙在報導不同題材的新聞時，會傾向使用什麼中國名稱？

Q2：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台灣報紙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各自連結著什麼樣的立場？

Q3：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台灣報紙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如何連結著朋友、敵對、互動、威權這四個中心主旨？

Q4：整合來看，在台灣報紙的中國報導中，所使用的中國名稱在不同時期，具有何種不同的意義？

至於香港，1977 至 1997 年以及 2007 至 2017 年分別是回歸前和回歸後的時期。香港在 1997 年由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境內的特別行政區。雖然香港華人對於中國向來有「祖國」的觀念，而不少香港市民亦在大陸出生，但也有不少香港人是在二戰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逃難到港的，對中共統治的態度往往屬於負面。但 97 回歸使香港華人需要面對回到中國治理下的現實，中國除了是文化上的祖國外，也正式成為主權國，中共則是國家的執政黨。這些

都會影響「中國」和「中共」等名稱的使用方法。如對台灣的分析一樣，我們就香港的情況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Q5：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香港報章在報導不同題材的新聞時，會傾向使用什麼中國名稱？

Q6：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香港報章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各自連結著什麼樣的立場？

Q7：在兩個個別時段之中，香港報章報導中國時使用的名稱，如何連結朋友、敵對、互動、和威權這四個中心主旨？

Q8：整合來看，在香港報章的中國報導中，所使用的中國名稱在不同時期，具有何種不同的意義？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方法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這是在傳播研究的領域中普遍用來探討媒體內容訊息的一種研究方法，這個方法具有客觀 (objective)、系統性 (systematic)、量化 (quantitative)、探討傳播的顯明內容 (manifest content) 等特色 (Berelson, 1952)，適合本研究針對長時間新聞內容的跨國比較研究。

在樣本的選取上，本研究在港、台各抽取四份報紙。香港的報紙包括：《明報》、《文匯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這四份報紙涵括了香港傳媒的政治光譜。《蘋果日報》在 1995 年創辦，一直以支持民主價值聞名；《文匯報》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左派報章；《明報》則在 1959 年創立，早期是頗為大眾化的報章，但在 70 年代開始漸漸演變成專業菁英報紙；《星島日報》在 1938 年創立，原來較親台灣的國民黨，在 2001 年易手後，由親中政協何國柱擁有，漸漸變為一份親中國政府的報章。

在台灣同樣依據政治光譜的分布抽取四份報紙，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台灣蘋果》（即在台灣出版的《蘋果日報》，為免混淆，在本文以《台灣蘋果》為名）。《聯合報》於 1951 年創刊，言論立場一直維持傾向國民黨。《中國時報》原名《徵信新聞》，1968 年更名為《中國時報》，2008 年由旺旺集團所購買，言論立場由親國民黨轉為傾向中國。《聯合報》、《中國時報》在 1980 年代，即已形成寡占的市場，在 1988 年報禁解除後仍維持相當的優勢。《自由時報》、與來自香港的《台灣蘋果》則分別於 1997 年和 2003 年加入報紙產業的競爭，成為今日台灣的主流報紙。《自由時報》在言論立場上較傾向民進黨，《台灣蘋果》的政黨立場則較為中立，但也有可能跟香港的《蘋果日報》一樣具有反中國的傾向。

在時間上，由於資源有限，本研究抽取以上 8 家報紙自 1970 年代至今的 5 個特定年份，包括：1977、1987、1997、2007、2017，共橫跨 5 個 10 年與兩個世紀的時期。^① 由於創辦的時間不一，香港的 4 家報紙中，《蘋果日報》是在 1997 年才被加入抽樣之中，台灣的《自由時報》、與《台灣蘋果》則分別在 1997、2007 年才加入抽樣的範疇中。本研究以建構性星期抽樣（constructed week sampling）的方式，選取兩個建構式星期，亦即在該年中隨機選取兩個星期一、兩個星期二……等，如此類推至兩個星期日，組成兩個建構式星期。然後，在這些抽取出來的天數中，收集所有在新聞中提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共產黨、中國大陸等稱謂的中國新聞。由於在香港，特別是在中國開放之後，新聞的報導量很大，因此在 1987 年與之後的樣本，只包括每日最多 6 篇的新聞（從版面配置選取最重要的 6 篇），台灣的部份，則是包含當日所有出現的中國新聞。最後，我們共抽選出 2,771 則樣本，其中包含 1,677 則台灣的樣本與 1,094 則香港的新聞樣本（請見表一）。

^① 由於研究時程的規畫，本研究的樣本只到 2017 年，並未包括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之後的新聞報導。

表一 本研究的新聞樣本在不同年份的分佈

	1977	1987	1997	2007	2017	總計
台灣						
聯合報	51	55	163	93	85	447
中國時報	44	55	298	70	50	517
自由時報	0	0	96	127	178	401
台灣蘋果	0	0	0	200	112	312
總計	95	110	557	490	425	1677
香港						
明報	79	67	64	49	54	313
文匯報	50	57	64	57	70	298
星島日報	88	70	62	45	55	320
蘋果日報	0	0	58	50	55	163
總計	217	194	248	201	234	10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爲了能夠進行有效的比較分析，本研究將樣本切分爲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不代表這是個斷裂點，而是長期演變過程下的結果。這兩個時期的分割，如前文所述，符合兩岸三地之間關係的重要轉折與改變，在香港主要是 1997 年回歸中國之前與之後的差異，在台灣則是 2000 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由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執政。

編碼的分析單位爲一篇樣本新聞。編碼的類目由三位作者共同發展而成，包含：對於中國的命名、新聞的題材、報導傾向、框架等，相關的類目分類方法，請見以下說明：

(一) 中國的命名：主要分爲 4 類，包括：(1)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2) 中共/共產黨、(3) 中國大陸、(4) 其他；

(二) 報導傾向：對於中國的立場傾向，分爲正面、負面、中性等 3 類。在編碼時，是根據該篇文章的遣詞用字和選擇的報導角度，進行判斷，例如：

聚焦經濟發展的成果、討論對民眾有益的政策改革等，即為正面傾向；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即為負面傾向；僅客觀描述事實，即為中性傾向；

(三) 新聞題材：本研究借用 Cohen (2013) 所進行的跨國電視國際新聞研究中對議題的劃分，再加以修正，成為一個共有 27 個類別的變項（包括：國內政治、國際政治、軍事、社會秩序、經濟、教育、社會福利、運輸、文化、人情趣味、觀光等等），因應分析的需要，我們在分析時將 27 個議題歸納為國內政治、國際政治、商業經濟、社會文化等 4 個題材；

(四) 中心主旨：包括 4 個主旨：(1) 朋友：中國與港 / 台是友好的關係；(2) 敵對：中國與港 / 台是敵對的關係；(3) 互動 (engagement)：中國與世界有互動關係；(4) 威權：中國是威權或極權的國家。

前三項的類目一命名、報導傾向和新聞題材的編碼是用單選方式，主要是依據每則新聞的標題與導言（第一段）來加以判斷，在幾個分類中選擇出一個被新聞編輯處理放在最顯著和重要位置的選項。最後一項類目「中心主旨」的編碼則是複選，是就四個選項，逐一核對該樣本的全文是否包含此一項目，例如：若有「朋友」的主旨在其中，就編碼為「1」，如果沒有，即編碼為「0」，以瞭解四個主旨所有可能出現的次數。

編碼的進行交由港、台兩地傳播科系的研究生負責完成。這些編碼員經過訓練，以瞭解每個類目的意涵，再進行正式的編碼。大約有 10% 隨機抽取的樣本讓兩名編碼員同時進行編碼，主要類目的編碼員交互信度都在 Scott's pi = 0.80 或以上。

肆、研究結果

台灣報紙所使用的中國名稱

表二顯示，台灣報章在第一階段主要把中國稱為「大陸」或「中共」，兩者加起來共佔 81.5%。這似乎反映了那段時期的台灣報章仍在一定程度上把兩

岸問題視為中國內部國、共兩黨之間關係的問題。但到了第二階段，台灣報章則多用「中國」這個名稱，佔三分之二，另外21.5%的文章用了「大陸」，「中共」只剩下4.6%。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報紙使用的中國名稱，在第一、二時段之間，產生了系統性的改變。明顯地，台灣在民主化及出現政黨輪替之後，兩岸關係不再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關係。對台灣媒體而言，無論是否支持台獨，台灣至少是一個實際存在和獨立運作的國家（*de facto state*），所以兩岸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或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中共這名稱變得相對地不重要。另外值得補充的是，在兩個階段中，均有6至7個百分點的文章用了其他稱呼，這些名稱包括共匪、匪黨、匪區、北京等等。

回應 Q1，表二的下半部分顯示了名稱與報導主題在兩個階段中的關係。在第一階段，雖然台灣報章在整體上主要用上「中共」和「大陸」兩個名稱，但兩個名稱是用在不同題目之上的。談到中國國內政治或國際政治時，媒體會傾向用「中共」（64.9%和52.5%），但談到經濟或社會文化議題時，媒體則用上「大陸」（70.9%和62.2%）。另外，「中國」這名稱相對上較有可能在社會文化新聞中出現，在93篇使用了「中國」的報導中，50篇（即53.8%）屬社會文化新聞。另外，其他稱呼最有可能在國際政治新聞中出現，在48篇用上其他名稱的報導中，27篇（即56.3%）屬國際政治新聞。

但到了第二階段，無論是那一個題材，台灣媒體都是大幅地傾向使用「中國」。「中共」的稱謂在政治新聞中較有可能出現，但也遠遠不及「中國」。有趣的是，在第一階段中，對中國的稱呼在經濟及社會文化兩類新聞中是非常接近的，但到了第二階段，對中國的稱呼在經濟新聞及社會文化新聞中出現了一些分別。「中國」的稱呼在經濟新聞中尤其顯著，佔百分比高達82.3%，在社會及文化新聞中，「大陸」的出現比例則明顯地較在其他三類新聞中高。可以說，雖然台灣媒體在第二階段整體上少了用「大陸」來稱呼中國，但社會文化新聞仍較有可能用上這名稱，反映了無論政治關係如何變動，兩岸在社會文化上仍有其密切關聯，指向地方的「大陸」這個名稱仍有一定程度的適用性。

表二 台灣新聞報導所使用的中國名稱與報導題材的關係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N	%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第一階段	93	12.2	287	37.7	334	43.8	48	6.3	762	100.0
第二階段	609	66.6	42	4.6	197	21.5	67	7.3	915	100.0
$\chi^2 = 591.2, df = 3, p < .001$										
第一階段										
國內政治	12	9.0	87	64.9	28	20.9	7	5.2	134	100.0
國際政治	27	10.6	134	52.5	67	26.3	27	10.6	255	100.0
經濟商業	4	5.1	16	20.3	56	70.9	3	3.8	79	100.0
社會文化	50	17.0	50	17.0	183	62.2	11	3.7	294	100.0
$\chi^2 = 173.2, df = 9, p < .001$										
第二階段										
國內政治	54	62.1	8	9.2	11	12.6	14	16.1	87	100.0
國際政治	145	61.7	29	12.3	35	14.9	26	11.1	235	100.0
經濟商業	158	82.3	0	0.0	30	15.6	4	2.8	192	100.0
社會文化	252	62.8	5	1.2	121	30.2	23	5.7	401	100.0
$\chi^2 = 106.6 (p < .001 \text{ in Fisher's Exact Test})^*$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明：* 由於第二階段的交叉分析，有 20% 以上的細格，其樣本數小於 5，所以統計檢驗方法改用 Fisher's Exact Test。

回應 Q2，表三顯示了台灣媒體中的中國名稱與報導立場之間的關係。將整個樣本統合來看，無論是用那一種稱呼，負面報導都比正面報導要多，但相比之下，負面報導比例最高的是用上了「中共」的報導。這不難理解，因為在近代中國史中，兩岸出現兩個政權是國共內戰的結果，從近代史角度看，「中共」指向的是台灣政權的敵人。同時，相比之下，指向地方和社會的「大陸」一詞，則沒有那麼負面。

本文進一步使用 Janis-Fadner 係數來衡量媒體偏好度 (media favorableness) (Janis and Fadner, 1965, 引自 Deephouse, 2000:1102)，這個公式的計算方式如下：

$$\text{媒體偏好係數 (Coefficient of media favorableness)} = \begin{cases} (f^2 - fu)/(total)^2 & \text{if } f > u; \\ 0 & \text{if } f = u; \\ (fu - u^2)/(total)^2 & \text{if } u > f; \end{cases}$$

在此一公式中，f 代表媒體對某一事物具有偏好的數量；u 代表媒體不具偏好的數量；total 則是整體加起來的數量。媒體偏好度係數的範圍介於 -1 和 1 之間，1 代表的是在該年中全部皆為正面的報導，-1 則是全部皆為負面的報導，0 則是指介在正、負面之間的一種平衡。本文以此公式計算台灣媒體有關中國報導的立場取向，在整體樣本中，當用上「中共」時，Janis-Fadner 係數是 -0.405，當用上「中國」時，係數是 -0.205，當用上「其他」稱謂時，係數是 -0.203，當用上「大陸」時，係數則是 -0.124。

若將兩個階段分開來看，結果仍然大同小異，無論是第一階段抑或是第二階段，當用上「中共」時，報導傾向都最有可能是負面。用 Janis-Fadner 係數來計算，用上「中共」的報導，在兩個階段的係數分別為 -0.398 和 -0.0452。換句話說，「中共」的負面意涵在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還要強烈一點。除此之外，在第一個階段，當報導用上「中國」時，負面報導的比例有 19.4%，正面報導有 3.2%，到了第二個階段，當報導用上「中國」時，負面報導的比例增至 26.8%，用 Janis-Fadner 係數來計算，報導用上「中國」時，係數在兩個階段分別為 -0.138 及 -0.214，亦即「中國」這個稱謂在第二階段變得更可能跟負面報導連結起來。

與之相反的是，在第一階段，當報導用上「大陸」時，負面報導的比例有 23.1%，但正面報導也有 6.0%。用 Janis-Fadner 係數來計算，係數為 -0.138。到了第二個階段，當報導用上「大陸」時，負面報導的比例下降至 16.2%。雖然正面報導的比例也下降了一點，但用 Janis-Fadner 係數來計算，係數在兩個

階段分別為 -0.138 和 -0.104，亦即用上「大陸」名稱的報導比在第二階段之前變得相對上沒有那麼負面。同時，若是用「其他」稱呼的話，用 Janis-Fadner

表三 台灣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立場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Janis-Fadner 係數	-0.205		-0.405		-0.124		-0.203	
正面	21	3.0	3	0.9	27	5.1	7	6.1
中立	500	71.2	187	56.8	395	74.4	73	63.5
負面	181	25.8	139	42.2	109	20.5	35	30.4
Total	702	100.0	329	99.9	531	100.0	115	100
$\chi^2 = 59.569, df = 6, p < .001$								
第一階段								
Janis-Fadner 係數	-0.138		-0.398		-0.138		-0.228	
正面	3	3.2	3	1.0	20	6.0	3	6.3
中立	72	77.4	164	57.1	237	71.0	29	60.4
負面	18	19.4	120	41.8	77	23.1	16	33.3
Total	93	100	287	99.9	334	100.1	48	100
$\chi^2 = 40.4 (p < .001 \text{ in Fisher's Exact Test})^*$								
第二階段								
Janis-Fadner 係數	-0.214		-0.0452		-0.104		-0.185	
正面	18	3.0	0	0.0	7	3.6	4	6.0
中立	428	70.3	23	54.8	158	80.2	44	65.7
負面	163	26.8	19	45.2	32	16.2	19	28.4
Total	609	100.1	42	100.0	197	100	67	100.1
$\chi^2 = 21.0, df = 6,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明：* 由於第一階段的交叉分析，有 20% 以上的細格，其樣本數小於 5，所以統計檢驗方法改用 Fisher's Exact Test。

係數來計算，係數在兩個階段分別為 -0.228 和 -0.185，亦即負面傾向在第二階段稍為變弱。以上的結果說明，同一個名稱—無論是「中共」、「中國」，抑或「大陸」—在不同時期所表達的傾向可以有些微但重要的轉變。至於「其他」稱謂的轉變，則很可能是帶有明顯負面意涵的「共匪」或「匪區」等名稱，在第二階段較少出現。

回應 Q3，表四顯示了台灣媒體中的中國稱謂與新聞中心主旨之間的關係。整體來看，在用上敵對主旨的報導中，最常見的是「中國」，其次才是「中共」，這與之前提到「中共」作為敵人的理解有點出入。不過，在用上威權主旨的報導中，最常見的就是「中共」，其次才是「中國」。相對之下，「大陸」較有可能在用上友誼中心主旨的報導中出現。

但若分開兩個階段來看，在第一階段，相對於用上敵對、互動、或威權主旨的報導，當報導用上友誼主旨時，「中共」的出現率是較低的，而「大陸」的出現率則較高。所以，中共一詞在第一階段的確聯繫到敵對或至少不友善的意思，只是這種不友善的意思在互動和威權中心主旨中都存在。另一方面，跟表三的發現相近，「大陸」的意思是相對沒有那麼負面的，所以較有可能在友誼主旨中出現。這種框架包裹的類型在第二階段仍然存在，只不過「中國」取代了「中共」成為最常見的命名，而它在敵對、互動和威權等主旨的新聞中特別常出現。友誼主旨則較為特別，當用上了友誼主旨時，報導會相對上較少使用「中國」，而相對地較多使用「大陸」或其他稱呼。

以另一方式解讀，表四的發現也跟表三的結果有所呼應。在第一階段，使用友誼主旨的報導出現「中國」稱呼的比例，比使用其他主旨的報導中出現「中國」稱呼的比例都要高。但在第二階段，使用了友誼主旨的報導中出現「中國」這稱呼的比例，比使用了其他中心主旨的報導中出現「中國」這稱呼的比例都要低，這符合以上提到的，「中國」這名稱的意涵在第二階段變得較之前負面這一點。

回應 Q4，總括而言，台灣媒體的中國報導在不同時期用上了不同的稱呼，

其中最重要的轉變是由「中共」或「大陸」轉向「中國」，反映的是兩種對兩岸關係的理解，即「同一國家內的敵對勢力」和「兩個實際地獨立運作的政權」。同時，「中國」這名稱在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更可能連繫到負面的報導和敵對

表四 台灣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中心主旨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N	%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										
敵對	184	42.5	129	29.8	88	20.3	32	7.4	433	100.0
友誼	37	25.3	46	31.5	43	29.5	20	13.7	146	100.1
互動	43	37.4	41	35.7	23	20.0	8	6.7	115	100.1
威權	57	31.0	75	40.8	31	16.8	21	11.4	184	100.0
第一階段										
敵對	19	9.5	106	53.0	61	30.5	14	7.0	200	100.0
友誼	11	12.0	42	45.7	29	31.5	10	10.9	92	100.1
互動	3	5.7	34	64.2	10	18.9	6	11.3	53	100.1
威權	12	9.8	70	57.4	25	20.5	15	12.3	122	100.0
第二階段										
敵對	165	70.8	23	9.9	27	11.6	18	7.7	233	100.0
友誼	26	48.1	4	7.4	14	25.9	10	18.5	54	99.9
互動	40	64.5	7	11.3	13	21.0	2	3.2	62	100.0
威權	45	72.6	5	8.1	6	9.7	6	9.7	62	100.1

若將兩個時期帶有某中心主旨的報導中的中國稱謂作比較：

- 敵對 ($\chi^2 = 181.4, df = 3, p < .001$)
- 友誼 ($\chi^2 = 35.2, df = 3, p < .001$)
- 互動 ($\chi^2 = 51.6, df = 3, p < .001$)
- 威權 ($\chi^2 = 79.9, df = 3,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明：* 本表中的樣本數是將有涵括個別中心主旨的樣本分別納入計算，沒有涵括該中心主旨的樣本則被排除。

及威權兩個中心主旨。不過，不同的稱呼的出現也跟題材有關，到了第二階段，仍有不少中國社會文化新聞會用上「大陸」一詞。同時，尤其是在第二階段，用上「大陸」一詞的報導相對上沒有那麼負面，「大陸」一詞亦最有可能在用上了友誼中心主旨的新聞中出現。可以說，「大陸」一詞連繫著的是一種對中國以及兩岸關係相對沒有那麼負面的想像和理解，亦連結著兩岸的緊密交流。但台灣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始終是負面居多，第一階段中的「中共」和第二階段中的「中國」就承載著這些負面意涵。

香港報紙所使用的中國名稱

表五顯示，整體來看，香港的報紙有將近一半的新聞報導使用「中國」的名稱，第一、二階段分別為 48.9% 及 49.0%。「中共」的稱謂在第一階段有 24.6%，但在第二階段大幅降為 5.7%。「大陸」的名稱在第一階段佔 11.5%，在第二階段則增至 19.3%，「其他」的稱謂也從 15.0% 增加為 26.0%，其中「北京」佔了不少的比例。H2 所預期的在第一、二時段之間，香港報章使用的中國名稱會有所不同，是成立的。而這些轉變也不難理解，無論是回歸之前與之後，對香港媒體而言，「中國」都是一個直接的對整個國家的指稱，所以比例最高。「中共」則指向中國大陸的政權，在回歸後，大陸的政權也就是香港之上的中央政府，所以媒體少了使用「中共」，卻多用了如「北京」等「其他稱謂」。至於「大陸」一詞的使用頻率上升，則大抵跟社會文化新聞在第二階段的比例上升有關。

回應 Q5，如果就新聞題材的分佈來看，在第一階段，報導中國內部政治時，香港報章使用「中國」和「中共」的比例相若，但到了第二階段，在報導中國國內政治時，香港報章使用最多的是「其他」稱呼，即主要是以「北京」來指向中央政府，當做為中國內部的特別行政區時，使用首都的名字指向中央政府，也是不同國家的媒體都會使用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階段，「中共」這稱呼，無論在甚麼議題的新聞中都是可能出現的，但到了第二階段，「中

共」的稱呼幾乎只會在國內政治新聞中出現，在國際政治新聞和經濟新聞中，「中共」這稱呼是完全不會出現的，在社會文化新聞中，也只有 3.1% 的報導使用「中共」。可以說，到了回歸後，香港媒體基本上不會用「中共」來稱呼中國，這名稱的出現，很大程度上侷限於有需要直接指向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報導，如報導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之間，在社會文化及經濟兩類新聞中，雖然都主要直接使用「中國」這名稱，但同時使用「大陸」一詞的比例也有所上升。有趣的是，在第一階段，使用「中共」以及使用「大陸」的社會文

表五 香港報紙新聞所使用的中國名稱與報導題材的關係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N	%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第一階段	322	48.9	162	24.6	76	11.5	99	15.0	659	100.0
第二階段	213	49.0	25	5.7	84	19.3	113	26.0	435	100.0
$\chi^2 = 81.5, df = 3, p < .001$										
第一階段										
國內政治	78	31.7	86	35.0	35	14.2	47	19.1	246	100.0
國際政治	120	65.9	37	20.3	6	3.3	19	10.4	182	100.0
經濟商業	53	52.0	15	14.7	17	16.7	17	16.7	102	100.0
社會文化	71	55.0	24	18.6	18	14.0	16	12.4	129	100.0
$\chi^2 = 66.2, df = 9, p < .001$										
第二階段										
國內政治	26	23.0	20	17.7	16	14.2	51	45.1	113	100.0
國際政治	77	77.0	0	0.0	3	3.0	20	20.0	100	100.0
經濟商業	32	50.8	0	0.0	18	28.6	13	20.6	63	100.0
社會文化	78	49.1	5	3.1	47	29.6	29	18.2	159	100.0
$\chi^2 = 119.4, df = 9,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化新聞合計共佔 32.6%，在第二階段，兩者合計也佔 32.7%，幾乎完全沒有變化，變化是絕大部分使用「中共」的報導都變成使用「大陸」。這對經濟新聞報導而言也是一樣。

回應 Q6，表六呈現了香港報紙所使用的中國名稱與報導立場的關係。整體來看，使用「中國」的報導相對上最可能持正面立場（18.5%），而使用「大陸」的報導則最少有正面立場（4.4%）。使用「中共」的報導則是正、負面兩個立場的差距並不大，分別為 12.3% 和 14.4%。若以 Janis-Fadner 係數計算，在香港樣本中，當用上「中國」時，Janis-Fadner 係數是 0.064，當用上「大陸」時，係數是 -0.071，當用上「中共」時，係數為 -0.012，當用上其他稱謂時，係數則是 0.016。整體上，幾個係數均較接近零，顯示媒體傾向並不明顯，但幾個名稱所連繫到的立場仍有一些差異。

如果分為兩個階段來看，則可看出「中國」與「大陸」兩個名稱在不同時期有頗為明顯的差異。在第一階段中，使用「中國」的報導，有 6.2% 為負面報導，到了第二階段，比例上升到 13.1%，雖然正面報導的比例也由 17.1% 微升至 20.7%，但 Janis-Fadner 係數仍然由 0.080 下降至 0.049。亦即是說，使用「中國」的報導的正面傾向，在第二階段有所減弱。同時，在第一階段中，使用「大陸」的報導，有 7.9% 為負面報導，6.6% 為正面報導，到了第二階段，負面報導比例上升至 19.0%，正面報導的比例則下降至 2.4%。兩個時期的 Janis-Fadner 係數分別為 -0.007 以及 -0.148。亦即是說，「大陸」新聞的負面傾向，其實在回歸後才出現。

回應 Q7，表七呈現香港報紙的中國名稱與中心主旨之間的關係。整體來看，在具備友誼、互動、和敵對主旨的報導中，都有七成以上的報導使用「中國」，約一成使用「中共」，一成使用其他稱呼，而極少使用「大陸」。在具備威權主旨的報導中，也有五成以上使用「中國」，但有趣的是，威權主旨的報導中有 17.4% 使用「大陸」。

表六 香港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立場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Janis-Fadner 係數	0.064		-0.012		-0.071		0.016	
正面	99	18.5	23	12.3	7	4.4	25	11.8
中立	388	72.5	137	73.3	131	81.9	168	79.
負面	48	9.0	27	14.4	22	13.8	19	9.0
Total	535	100.0	187	100.0	160	100.0	212	100.0

$$\chi^2 = 27.3, df = 6, p < .001$$

第一階段

Janis-Fadner 係數	0.080		-0.004		-0.007		0.003	
正面	55	17.1	20	12.3	5	6.6	10	10.1
中立	247	76.7	118	72.8	65	85.5	82	82.8
負面	20	6.2	24	14.8	6	7.9	7	7.1
Total	322	100.0	162	99.9	76	100.0	99	100.0

$$\chi^2 = 17.8, df = 6, p < .01$$

第二階段

Janis-Fadner 係數	0.049		0		-0.148		0.004	
正面	44	20.7	3	12.0	2	2.4	15	13.3
中立	141	66.2	19	76.0	66	78.6	86	76.1
負面	28	13.1	3	12.0	16	19.0	12	10.6
Total	213	100.0	25	100.0	84	100.0	113	100.0

$$\chi^2 = 21.1 (p < .01 \text{ in Fisher's Exact Test})$$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明：* 由於第二階段的交叉分析，有 20% 以上的細格，其樣本數小於 5，所以統計檢驗方法改用 Fisher's Exact Test。

分開兩個階段來看的話，我們可以見到，最主要的轉變在「中共」這名稱於擁有各中心主旨的報導中的全面消失。無論是敵對、友誼、互動、抑或是威權主旨，在第一階段，均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報導文章會用上「中共」的名稱，

但到了第二階段，則是一律為 0.0%。這也符合以上提過的，到了第二階段，只有聚焦中國國內政治的報導才會主要使用「中共」，而且使用時大都是因為的確需要指向中國共產黨，「中共」變成一個不太附帶著意識形態或情感的名稱。

表七 香港報紙新聞的中國名稱與新聞中心主旨的交叉分析

	中國		中共		大陸		其他		總計	
	N	%	N	%	N	%	N	%	N	%
整體樣本 *										
敵對	85	70.8	18	15.0	4	3.3	13	10.8	120	100.0
友誼	67	77.0	9	10.3	1	1.1	10	11.5	87	100.0
互動	149	71.6	30	14.4	3	1.4	26	12.5	208	100.0
威權	13	56.5	3	13.0	4	17.4	3	13.0	23	100.0
第一階段										
敵對	49	63.6	18	23.4	3	3.9	7	9.1	77	100.0
友誼	25	67.6	9	24.3	0	0.0	3	8.1	37	100.0
互動	90	67.2	30	22.4	2	1.5	12	9.0	134	100.0
威權	6	50.0	3	25.0	2	16.7	1	8.3	12	100.0
第二階段										
敵對	36	83.7	0	0.0	1	2.3	6	14.0	43	100.0
友誼	42	84.0	0	0.0	1	2.0	7	14.0	50	100.0
互動	59	79.7	0	0.0	1	1.4	14	18.9	74	100.0
威權	7	63.6	0	0.0	2	18.2	2	18.2	11	100.0

若將兩個時期帶有某中心主旨的報導中的中國稱謂作比較：

- 敵對 ($\chi^2 = 15.2, p < .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 友誼 ($\chi^2 = 14.7, p < .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 互動 ($\chi^2 = 27.6, p < .001$ in Fisher's Exact Test)
- 威權 ($\chi^2 = 3.2, p > .05$ in Fisher's Exact Test)

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整理。

說明：* 本表中的樣本數是將有涵括個別中心主旨的樣本分別納入計算，沒有涵括該中心主旨的樣本則被排除。

在第二階段，主要使用「中共」的報導消失後，多了的是使用「中國」和使用其他名稱的報導。

回應 Q8，總結而言，「中國」是香港報紙最常使用的名稱，在兩個時期皆佔有將近半數的比例，但這個名稱在兩個時期帶有不同的意涵，而且具有相當複雜的意義糾葛。「中國」在兩個階段中，都以出現在國際政治的新聞中為主，並具有較為正面的報導立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個階段，它的負面立場較之前增加了一倍之多。而這個名稱也與敵對、友誼、互動等三個主旨皆有相關，到了第二個階段相關性更強。「中共」的名稱在第一階段較多，但到了第二階段幾乎甚少使用，主要都在國內政治的題材中出現，而這也是一個較為中立的名稱，正、負面的立場差異不大，而且在第二階段，基本上不會與幾個中心主旨同時出現。「大陸」的名稱在第一階段較少，但到了第二階段，與以「北京」為主的其它名稱取代了「中共」的稱呼。「大陸」的名稱對香港而言，是一個在地理位置與政經社會文化關係等面向上表達距離接近的稱呼，大都出現在國內政治、商業經濟、社會文化的新聞中，後兩者在第二個階段香港的回歸之後增加更多，雖然如此，但「大陸」的名稱卻通常連結的是負面的立場，並且在第二個階段又較前更為負面。

伍、結論

本研究企圖瞭解 1970 年代至 2010 年代在香港、台灣兩個社會的新聞報導中，有關中國各種名稱做為框架包裹其中的一個元素，其所具有的意涵，以及產生的差異與變化。研究發現，在港、台兩地新聞報導中常用的中國名稱，包括：中國、中共、大陸等，在兩地的兩個時段，都具有不同的意涵，每一個命名都必放置在更寬廣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中，亦即港 / 台與中國之間的互動，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關係，去辨認它所畫出的界限，較能得到深入的理解。

由前文的分析來看，如果將香港和台灣的結果合併討論，可以發現從地緣

政治學 (geopolitics) 的角度來看，各自具有不同的複雜性，因此在媒體中對於中國所使用的名稱，港 / 台灣媒體都建構了不同的意義。例如對台灣來說，「中共」就是敵人，縱使在國民黨結束威權統治以及兩岸重新接觸之後，「中共」作為敵人這一點並沒有完全改變。「中共」這名稱在第二個時段的台灣媒體出現機會少了很多，但只要它出現時，這名稱連繫著的是負面報導、有關國際政治及中國國內政治的新聞，以及互動的主旨。相比之下，在香港的語境中，「中共」不能算是「敵人」。而且在香港的報業傳統中，親大陸的報章一直存在，「左報」一直是香港新聞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只要大報被納入研究之中的話，在整體上香港媒體不會對「中共」有非常明顯的負面態度。尤其在回歸之後，中國共產黨是特區所屬國家的執政黨，在媒體的內容中，「中共」更加明顯地變成一個價值中立的指稱。

另一個有趣的對比是「大陸」。這名稱對作為島嶼的台灣而言，較具有友好、親近的意味，從近代史的發展來說，國民黨就是從「大陸」退守台灣，「大陸」有血脈相通的文化意義，也有後來經濟市場的連結在其中。所以，在幾個名稱之間，使用「大陸」的報導在相對上是最不負面的，這名稱也較少出現於威權或敵對主旨的報導中。對於香港而言，戰後的難民潮是香港人口膨脹和社會發展的根源，「大陸」是很多上一輩市民的出生地，但長期以來也附帶著相對落後、混亂等意味 (Ma, 1999)。所以使用「大陸」名稱的報導並不特別正面，而且可能連繫到威權的主旨。尤其在第二階段，雖然香港已經回歸，大陸的社會和經濟也逐步發展，但這些發展也帶來各種問題，往往成為香港媒體的焦點，所以關於「大陸」的報導在回歸後其實更為負面。

最後，「中國」這名字，對於台灣而言，最早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相爭的法統，但到了近年，則成為對於對岸的國家稱呼，使用這一個名稱，象徵台灣的主體認同，帶著視中國為另一個不同國家的意味，這個名稱的使用具有建立台灣本身主體認同的作用。因此，中國的名稱跟負面報導掛勾，而且負面傾向在第二時段更強，在此時段，超過七成帶有威權或敵對主旨的報導，都是使用「中

國」的名稱。但在香港，「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個相對中立的所指，同時它也是「祖國」，被視為文化的根源，相比之下，「中國」這名稱沒有「中共」這名稱的政治意義，也沒有「大陸」一詞的負面指向。所以在回歸前，使用「中國」的新聞報導，在整體上是稍為傾向正面的，反而是回歸之後，關於「中國」報導的整體正面傾向有所減弱。

由此可見，在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之中，不同的命名所具有的微妙意義。當然，我們要留意的是，使用個別名稱的報導在不同時期連繫著不同的態度或中心主旨，部分是反映了現實的轉變。例如香港媒體在回歸後用上「中國」名稱的新聞反而沒有之前正面，可能是反映了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在國際間的表現反而可能有更多被爭議或商榷之處。但當我們把幾個名稱合併考慮時，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中共」、「大陸」、「北京」等，在特定的時空會組成一系列指向同一地方，但又卻帶有不同意涵的名號，而媒體在使用這些名號時，有時是有選擇性的。新聞媒體對於其它國家所使用的名稱不只是傳遞資訊而已，常常也是在做畫界的工作，在地緣政治的敵對或友好的複雜關係中，畫出一條界線，說明對方與我方彼此之間的關係，建構政治的真實，也傳達出評價的態度。

對於國家指稱的命名，可說是一種意義競爭的場域，雖然看似平常、不經意的使用，但卻是構築「平庸國族主義」(Billig, 1995)的一個重要組成。因此，命名的使用在定義他國的同時，其實也在定義自己的國家或社會(Chang and Holt, 2015)。在面對當前台灣與香港社會的民主治理受到來自中國做為霸權或內或外的威脅時，本研究回顧了過去 50 年之間港、台新聞媒介對於中國名稱框架的改變，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瞭解有關「中國」的名稱做為一種符號機制，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中充滿變動的意義，這些變動也反映兩個社會中民主發展的消長態勢，而從媒介的文本符號加以探討，正可以理解民主日常運作的機制在最細微與不經意之處。

最後，本文有三個侷限是需要指出的，而它們亦指向一些後續研究的可能

性。第一，本文分析港台兩地 2771 篇新聞報導，所以採取了量化分析的進路，配合對兩地歷史脈絡的理解，詮釋分析中出現的各種結果。但意義建構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始終難以完全用數字的方式表達，未來的分析可以用質化的文本或論述分析方法，理解個別名稱和其他框架機制如何具體地在文本結合起來生產意義。

第二，量化分析的效率建基於分析和變項的精簡程度，所以本研究把中國的名稱分為四大類，即「中國」、「中共」、「大陸」以及「其他」。在「其他」稱呼中，「北京」佔了不少的比重，但本研究並未將其與另外的稱呼區分開來。同時，無論在香港或台灣，也可能有一些較特殊的稱呼，如早期台灣媒體口中的「共匪」，這些獨特稱呼的出現頻率不高，但它們在個別新聞文章中的存在，是值得注意的，它們的使用可能顯示了，在甚麼特殊情況下，媒體會覺得常用的名稱並不足夠表達某些意義，而了解這些特殊情況，可幫助我們對如何稱呼中國這問題有更全面和準確的了解。

第三，本研究在台港兩地均包括了四份報章，以覆蓋兩地報業系統中的不同部分。事實上，香港的傳媒系統從來都有高度的政治平行，有「左」、「中」、「右」的報章，台灣民主化後，也出現了藍綠營媒體涇渭分明的狀態。而有一些報紙雖然發行量較小，但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如：台灣在戒嚴時期較能表達異議聲音的《自立晚報》或《民眾日報》，都沒有被含納在本研究的樣本之中。由於本文是一個大計畫中的部份結果呈現，有關港台不同媒體之間中國新聞的內容比較，呈現在另一篇已發表的論文當中（李立峯、蕭蘋、吳浩銘，2023）。李立峯、蕭蘋、吳浩銘（2023）的論文主要發現，港、台個別媒體機構之間確實存在明顯差異，這與媒體系統所具有的關聯政治強弱與政治平行程度的高低有關，但個別的媒體機構與媒體系統在這段長時期之間也會所轉變，當這些轉變結合起來時，則會帶來中國報導在整體上的穩定性。本文則集中在兩地媒體的整體傾向上，為免將分析過分複雜化，並沒有探討媒體機構之間的分別。但我們可以預期，既然不同的中國名稱附帶不同的意義，而這些意

義的挪用又跟政治立場相關，不同立場的報章應該會傾向使用不同的名稱，又或者在使用同一名稱時有不同的傾向，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無論如何，本文強調命名做為一種符號機制，出發點在探討新聞和政治語言中一些不起眼但卻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命名做為媒體框架包裹的一部份，也與包裹中的其它元素，如立場、題材、主要架構等相連，浮現出類型，具有相當的統合性。是這些不同元素之間的相互連結，在新聞中共同建構敘事，給予命名意義與生命。由於命名具有權力共鳴效果，也會生產出相關的論述與框架，因此不論是在何種領域的何種命名，它的出現、發展與變化，都值得未來研究進行深入的檢視。

參考書目

- 呂大樂 (2020)。《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Tai-lok Lui [2020]. *Embarrassment: Hong Kong Society Has Not Entered into the Discussion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李立峯、蕭蘋、吳浩銘 (2023)。〈媒體系統變遷下的中國新聞報導—美國、臺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新聞學研究》，第 156 期，頁 1-45。
(Francis L. F. Lee, Ping Shaw, and H. Denis Wu [2023]. "News about China in Changing Media Syste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S., Taiwan, and Hong Kong Newspape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 156: 1-45.)
- 葉靖斯 (2015)。〈香港政府要求公務員不談「中港關係」〉，《英國廣播公司》，2 月 1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2/150218_hongkong_political_correctness。2023/8/30。
- (Jing-sih Ye [2015].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sked the Civil Servants Not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ebruary, 18.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2/150218_hongkong_political_correctness [accessed August 30, 2023].)
- 劉世寧 (2018)。〈命名與秩序—先秦儒家「名」思想引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5 卷，第 5 期，頁 73-81。
- (Shi-yu Liu [2018]. "Naming and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Pre-Qin Confucian Ideas of Name and Statu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55, No. 5:73-81.)
- Alcoff, Linda Martín (2005). "Latino vs. Hispanic: The Politics of Ethnic Names."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31, No. 4:395-407.
- Anderson, Benedict Richard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Azaryahu, Maoz (1997).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6, No. 6:479-93.
- Bakhtin, Mikhail Mikhailovich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eds.) Trans. by Vern W. McGee.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enford, Robert D. and Davi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611-39.
- Berelson, Bernard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 Free Press.
- Bhatia, Michael V. (2005). "Fighting Words: Naming Terrorists, Bandits, Rebels and Other Violent Acto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6, No. 1:5-22.
-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New York: Sage.
- Blum, Susan D. (1997). "Naming Practices and the Power of Words in China."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6, No. 3:357-79.

- Brugman, Britta C., Christian Burgers, and Gerard J. Steen (2017). "Recategorizing Political Fra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taphorical Framing in Experiments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1, No. 2:181-97.
- Chang, Hui-ching and Richard Holt (2011). "Naming China: Taiwan's National Day Speeches as Identity Politic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 10, No. 3:396-415.
- _____. (2015). *Languag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aiwan: Naming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Chu, Yun-han (2004).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rosp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4, No. 4:484-512.
- Coakley, John (2009). "'Irish Republic', 'Eire' or 'Ireland'? The Contested Name of John Bull's Other Island."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80, No. 1:49-58.
- Cohen, Akiba A. (ed.) (2013). *Foreign News on Television*. New York: Peter Lang.
- Deephouse, David L. (2000). "Media Reputation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An Integr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Resource-based Theor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6, No. 6:1091-112.
- Du, Y. Roselyn, Lingzi Zhu, and Fan Yang (2018). "A Movement of Varying Faces: How 'Occupy Central' Was Framed in the News in Hong Kong, Taiwan, Mainland China, the UK,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2:2556-3577.
- Edelman, Murray J. (1971).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 Chicago, IL: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 _____. (1988).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ntman, Robert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4:51-58.
- Fairclough, Norma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 Fishman, Ted C. (2005). *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
- Fong, Brian C. 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Vol. 43, No. 5:523-56.
- Gamson, William A. and Andre Modigliani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5, No. 1:1-37.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an, Guy J. and Josephine Lukito (2015). "The Rise of the Dragon? Framing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in Elite American Newspap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7, No. 8:754-72.

- Ha, Louisa, Ke Guo, and Peiqin Chen (2022). "Mobilis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S. China-Trade War: A Comparison of U.S. and Chinese News Media."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ol. 28, No. 2:188-205.
- Ha, Louisa, Yang Yang, Rik Ray, Frankline Matanji, Peiqin Chen, Ke Guo, and Nan Lyu (2020). "How US and Chinese Media Cover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War and Peace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the Foreign Policy Equilibrium Hypothesis."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Research*, Vol. 14, No. 3:131-52.
- Horsman, Stuart (2006). "The Politics of Toponyms in the Pamir Mountains." *Area*, Vol. 38, No. 3:279-91.
- Howarth, Peter (2006). *China's Rising Sea Power: The PLA Navy's Submarine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 Isaacs, Harold R. (1958).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 Janis, Irving L. and Raymond H. Fadner (1965). "The Coefficient of Imbalance." In Harold D. Lasswell and Nathan Leites (eds.), *Language of Politics* (pp. 153-6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iewe, Amos (1998). "The Crisis Tool in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Ofer Feldman and Christ'l De Landtsheer (eds.), *Politically Speaking: A Worldwide Examination of Language Used in the Public Sphere* (pp. 79-90).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Krumbein, Frédéric (2014). "Media Coverag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7, No. 2:151-70.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Liou, To-hai (2013). "The Locus of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aiwan Journal of WTO Studies*, Vol. 23:83-109.
- Liu, Shujun, Mark Boukes, and Knut De Swert (2023). "Strategy Fram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China-US Trade Conflict Coverage." *Journalism*, Vol. 24, No. 5:976-98.
- Ma, Eric Kit-wai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Mackerras, Colin (1991).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Quail, Denis (2005).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5th ed.)*. London: Sage.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Miller, Eugene F. (1979). "Metaphor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3, No. 1:155-70.

- Nevins, M. Eleanor (2008). “‘They Live in Lonesome Dove’: Media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Apache Place-Naming Practices.”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37, No. 2:191-215.
- Ojo, Tokunbo (2016). “Framing of the Sino–Africa Relationship in Diasporic/Pan-African News Magazin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9, No. 1:38-55.
- Ooi, Su Mei and Gwen D’Arcangelis (2017). “Framing China: Discourses of Othering in US News and Political Rhetoric.” *Global Media and China*, Vol. 2, No. 3-4:269-83.
- Pan, Zhongdang, Chin Chuan Lee, Joseph Man Chan, and Clement York Kee So (1999). “One Event, Three Stories: Media Narratives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in Cultural China.” *Gazette*, Vol. 61, No. 2:99-112.
- Peng, Zengjun (2004).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An Across Time Analysis of Coverag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Los Angeles Tim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4, No. 1:53-67.
- Rodríguez-Wangüemert, Carmen, Vanessa Rodríguez-Breijo, and José-Manuel Pestano-Rodríguez (2019). “The Framing of China on Spanish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32, No. 3:123-38.
- Ross, Robert S. and Zhu Feng (2008).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Ian (201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End of a Legitimizing Ideolog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39, No. 2:83-99.
- Semetko, Holli A. and Patti M. Valkenburg (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0, No. 2:93-109.
- Smith, Viktor (2021). *Naming and Framing: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Words Across Disciplines, Domains, and Modal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 Steinfeld, Edward S. (2010).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mmerman, Martina (2010). “Naming and Framing in Belgian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liticians and the Political State of Affairs During the 2007 Government Formation Period in the Belgian Press.”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24, No. 1:120-38.
- Tuchman, Gaye W.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Van Gorp, Baldwin (2005). “Where Is the Frame? Victims and Intruders in the Belgian Press Coverage of the Asylum Issu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0, No. 4:484-507.
- _____. (2007).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7, No. 1:60-87.

- Wertsch, James V. (2002).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ke, Jürgen and Julia Achatzi (2011). "From Tian'anmen Square to the Global World Stage: Framing China in the German Press, 1986-2006."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 No. 3:348-64.
- Willnat, Lars and Yunjuan Luo (2011). "Watching the Dragon: Global Television News about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 No. 3:255-73.
- Yee, Herbert S. (ed.) (2010). *China's Rise-Threat or Opportunit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Zeng, Yuan (2018). "Detached Disseminator, Populist Watchdog and Facilitative Change Agent: The Professional Role Perception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China." *Journalism*, Vol. 19, No. 9-10:1397-416.

Naming and Fram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s Content on China in Hong Kong and Taiwan's Newspapers (1977-2017)

Ping Shaw, Francis L. F. Lee, and H. Denis Wu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tilizes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how Hong Kong and Taiwan, two societies that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China in geopolitics, use different China's namings in their news reports, what the implications are, and what the different changes ar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research regards the media's naming of China as part of the framing package, and explores how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different discourse communities, construct different China's namings (including: China, the CCP, the mainland, etc.) with varying meaning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study collected a total of 2,771 samples of news reports on China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from 1977 to 2017. The results found that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1977-1997 and 2007-2017, there were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the way various Chinese appellations were used in the news content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use of these names not only conveys the different evolution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ies within societ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Keywords: Hong Kong, Taiwan, China, press news, naming, framing, content analysis.

Ping Shaw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gender and me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ancis L. F. Lee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and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H. Denis Wu is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t Bosto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in refereed journals and co-authored books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and politics.

